

这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 100 年来研究的思想资源，而不应仅仅局限于传统哲学体系构架。(2) 发现理论困难。既包括理论同经验（人类文明形态的转换、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化、人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之间的冲突，也包括理论内容逻辑上的矛盾。这是理论困难的昭显，也是理论发展和创新的最好机遇。(3) 拓展研究视野。首先要摒弃哲学研究的自说自话，以历史的客观性来认识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关系。其次要以世界的眼光，以发展和创新的眼光来更新思维方式。4) 明确创新问题。即要使创新的问题具体化，而不是抽象地谈论创新。

二是对哲学理论创新的未来形态的研究。其中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地位的不同理解。有学者总结这方面的研究基本有三种态度：体系论、问题论、从问题到体系论。近年来关于体系与问题的争论是最彰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但体系与问题之争仍然是表面化的争论，归根到底，这场争论不是在同一种对话规则内进行的，也就是说尽管都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发展和形态问题，但一方的注意力在于如何在既有形态下展现新样式即从一个体系到另一个体系，另一方的注意力则在于形成一个“形态多样化”的研究局面。无论体系论或问题论，都是哲学思维方式转换中的内在自我冲突。这些年，我们已经习惯以自然、社会、思维这种三段式逻辑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构架，并达到了相当成熟和熟练运用的境地。在我们倡导哲学创新的今天，是以基本概念的延伸来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空间（如这些年多数学者所尝试的从实践论角度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还是用新的逻辑结构（如有的学者提出四段式逻辑结构：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还是别的什么，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总之，这次研讨会的召开是中国哲学界纪念中国共产党 80 周年、学习和贯彻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一次理论盛会，对于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推动哲学界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责任编辑 贾红莲）

（《哲学动态》2001 年第 9 期）

“基督宗教与当今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方 永 杨乐强 （武汉大学宗教学系 湖北武汉 430072）

【中图分类号】B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1)09-0004-04

由武汉大学宗教学系主办的“基督宗教与当今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2001 年 5 月 28—30 日在武汉大学召开。来自美国天主教大学、美国圣若望大学、国际天主教哲学研究会、美国精神心理研究所、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香港浸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国内外 20 多个学术机构以及相关部门的 40 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内容概述如下。

一、基督宗教与当今时代。与会者一致认为，基督宗教及其思想在人类历史还是一个“能动”的因素，它应当而且能够为当今时代的健康发展，为当今时代的和平事业和发展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有与会者指出：当代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失控”现象，不仅因过度“役物”而严重损害了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而且由于为“物欲”所左右，使不少人精神空虚或精神匮乏，成了“役于物”或“丧己于物”的“倒置之民”，造成了新的社会差别和社会对立。要消解这种“失控”现象，单靠政府和行政力量不行，还必须借助于其他精神力量，特别是宗教。这就提出了基督宗教的当代角色问题。一些与会者还专门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从当代人类发展范式的高度考察了这个问题，并指出：在当今时代，发展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增长的问题，而且是涉及到社会、文化、环境乃至精神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和全球化等范围宽广的十分复杂的问题。宗教作为人类文化的“最深层面”，在重构当代人类社会发展范式中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要素之一。还有人直接从分析我们时代精神状态的基本特征入手来考察和规定基督宗教研究的当代任务，并指出：虚无主义和技术主义乃我们时代精神状态的基本特征。前者毁灭了我们的历史家园，后者逐步使人变成物。这就使克服虚无主义和技术主义上升为当代基督宗教研究乃至当代整个思想的根本任务。

二、当代基督宗教伦理。与会者普遍认为，伦理问题始终是基督宗教中的一个根本问题。由于实行政教分离，基督宗教在西方从垄断性文化降格为一种亚文化，基督宗教在精神化和世俗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使得伦理在基督宗教中的地位更显突出。基督宗教伦理及其研究业已成为基督宗教及其研究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

一些与会者对当代西方基督宗教伦理作了比较具体的类型学考察，并指出：当代西方基督宗教伦理主要内蕴着“以神为中心的自我伦理”、“关注现实的社会伦理”和“面向全球的普世伦理”三个层面。这些层面在其发展过程中内蕴着一些难以解决的理论难题。例如，在自我伦理方面，存在着“神的统治”与“人的自治”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伦理方面，存在着基督宗教伦理在何种程度上接受世俗伦理又在何种程度上拒绝世俗伦理的难题；在普世伦理方面，存在着“宗教伦理的全球化”与“宗教伦理的本土化”的矛盾。

一些与会者还从面向全球的普世伦理的高度对传统基督宗教伦理思想作了批判性考察，并指出：在传统基督宗教的“爱的诫命”中“爱上帝”与“爱邻人”这两条原理在“邻人”为“非爱上帝者”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爱”的悖论。这就构成了基督宗教伦理及其博爱思想达到“面向全球的普世伦理”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所以，基督宗教伦理为要成为“普世伦理”的精神资源，它就必须“变革”自身，扬弃以“爱上帝”为至上原则的传统做法，使其原本特殊的伦理原则转化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伦理原则。

三、宗教对话与基督宗教在当代中国的处境化。与会者指出，基督宗教自产生起就在一直同各种各样的宗教对话，“梵二”会议的召开以及基督宗教特别是天主教对外寻求“对话”、对内倡导“合一”方针的确定和落实，使宗教对话以及与之相关的宗教比较越来越成为基督宗教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这种对话和比较不仅对基督宗教思想的深入研究、对基督宗教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促成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任务的践履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谈到宗教对话时，大多数与会者对坚持“唯我独真”的基要主义持批评立场，对宗教多元主义持赞赏态度，以为宗教多元主义与宗教对话是一种积极的“构成性关系”。有与会者还具体考察了宗教多元论的三种形态，这就是“混合多元论”、“理性多元论”和“灵性多元论”。这三种多元论之间并非是一种绝对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互存互补的关系，它们分

别适用于人性层面、理性层面和灵性层面的宗教对话。

与会的中国学者对基督宗教在当代中国的处境化问题表示了极大的热情。指出：一方面，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各宗教中，基督宗教是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宗教，这个现象值得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中国学术界对基督宗教的研究近 20 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开始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和当代中国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基督宗教在当代中国的处境化问题或本土化问题业已受到我国学界的普遍重视，不仅深入探讨了基督宗教的“中国化形式”问题，探讨了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相互融合的“契合点”（如道成肉身与天人合一，耶稣之爱与儒家之仁等），而且还提出了“汉语基督宗教神学”问题。但是，基督宗教在当代中国的处境化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不少与会者强调指出了基督宗教及其文化同中国宗教及其文化之间的本质差别，如对“道”、“罪”、规则、人性、神人关系的不同理解以及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差别等，所有这些差别都使基督宗教在当代中国的处境遭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此外，在讨论基督宗教在当代中国的处境问题时，有人明确地批评了“新保守主义”或“政治儒学”，认为它本质上是一种“惧怕外国文化”的“民族主义”。

四、宗教与文化。有学者认为，宗教神学归根到底是一种人学，是人的精神的一种投射。因此，从“文化就是人化”的观点，我们不妨把基督宗教本身看成一种文化。宗教同自然科学、特别是同当代科学技术的关系问题受到与会者比较普遍的关注。有人以“当代基督宗教与进化论”为题发言，指出：自 19 世纪以来，进化论与创世论一直是基督宗教研究中挥之不去的大问题。这一问题虽然在 20 世纪初期斯科普施猴子案后有所淡出，但随着基督宗教中新福音派势力的发展，这一问题最近在西方基督宗教学界又被凸现了出来。一些科学家和宗教思想家利用最新的科学理论如宇宙大爆炸论、耗散结构理论、统一场论等，来论证上帝的创世论。当代克隆技术的发展向基督宗教，特别是向其“人观”提出的挑战，引起了与会者极大兴趣。一些与会者据《尼西亚信经》中“受生而不是被造”的界定，强调了克隆人与正常人的本质区别，认为克隆人将损害人的尊严、人的平等权利，并从根本上消解了无条件的“所属”和无条件的“爱”，并会导致对社会弱势群体的进一步歧视，这是基督宗教的人观和伦理观所不能容忍、不能接受的。

与会者中有人专门考察了以“神圣性”或“神秘性”为根本特征的基督宗教的艺术观并指出：基督宗教艺术是以否定的方式——“黑暗”与“静默”——来凸现最神圣的对象——“全然相异者”——为审美特征的。与会者中还有人专门考察了《路得记》对路得亲情观的诗意表达，指出《路得记》的绝妙之处在于把亲情、人情和宗教感情，把心境和意境、自然之美和人伦之美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了。

五、宗教的内在本质与宗教陈述的意义。“宗教之内在本质与宗教陈述的意义”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话题。与会者指出：宗教的内在本质在于信仰，而信仰本质上是一种“关系”，即信仰主体与信仰之所指（Gegenstand）的面对面的相遇。对这一关系，有三种不同的处置方式：第一种为实在论，视信仰之所指为惟一真实的客观实在，最高的（1）或不可否认的实在（2）；第二种为现象主义，视信仰之所指为一种真实的精神实在，这种精神实在或外在于人（3）或内在于人（4）；第三种为主观主义，视信仰之所指为一纯粹的主观构建，或为自然力人格化的虚拟精神实在（5），或为人类自己的本性折射而成的虚拟精神实在（6）。这三种处置方式一方面互相对立，另一方面又互相渗透。从（1）到（6），客观性减弱而主观性逐步增强；从（6）到（1），客观性逐步增强而主观性逐步减弱。由此可以看出，宗教信仰之所指的探究，乍看起来非常抽象，其实是一个同宗教对话直接相关的问题，不仅同宗教

内对话、宗教间对话直接相关，而且同宗教与非宗教、有神论与无神论之间的对话直接相关。由于对信仰对象的理解有着共同的认识论结构，有神论者与无神论者、信徒与非信徒之间是能够通过对话达成相互理解的。

(责任编辑 孔明安)

(《哲学动态》2001年第9期)

德黑兰亚洲文明对话研讨会综述

刘一虹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北京 1007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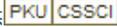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B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1)09-0007-02

联合国在欢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哈塔米提出的关于“文明对话”建议(1998年9月)的同时,于同年11月23号通过决议,将2001年确定为“文明对话年”。要求各国政府和相关机构组织并实施文化、教育和社会方面的各项活动,以倡导“文明间对话”这一主张。鉴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办了系列文明对话讨论会。首次讨论会题为:“亚洲文明对话:当前的差异与未来的汇聚”。应伊朗政府的邀请,我国外交部副部长王光亚率团出席了今年2月17—18日在德黑兰召开的“亚洲文明对话国际研讨会”。

此次会议提出,对话旨在拓宽并加强具有不同文化传统及价值观的群体相互间的积极作用,它与国际社会的基本原则是相和谐的,即国际和平与安全,国际合作、发展与繁荣,提高人权及人的尊严。大会设置了3个专题讨论小组,内容分别为:1组:亚洲文明与当代世界:亚洲文明在加深全球不同社会间的相互理解中能起到什么作用?2组:亚洲文化与文明如何有助于人类社会的和谐与宽容的进程;3组:亚洲文明与世界和平:不同的亚洲文明如何为世界和平、安全与人类发展做出贡献?

与会学者分别来自印度、日本、韩国、朝鲜、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诸国。学者们一致认为,文明对话应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而展开,相互尊重则是“对话”的基础。在“不存在单一文化”的今天,蕴含人类早期文明源头的亚洲文明必须随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更新(韩国学者)。这里有三个层面的更新:文化、语言及意识;技术可以超越地域、文化渗透是不可抵挡的,但不要被政治和经济原因所驱使(菲律宾学者);本土宗教面临选择:要么改革,适应情势发展,要么守旧,沦落为邪教(日本学者);强调语言在两种文化间的沟通作用,要打破遗产的束缚,穿越遗产的境域,从民族文化的研究走向世界文化的研究,而文化交流的第一步就是:把亚洲学者的论文译成英文及其它欧洲文字,从而寻求合作的途径(英国学者)。另一日本学者指出:“当代”一词已不象它的单词那样简单,容易界定,而是在人类进程中、在历史事件中拥有了很复杂的内涵,提出要看清“文明”的实质,而“新知识的生产模式”的得以建立,关乎亚洲对全球化的世界所能给予的贡献。在就“彼此尊重,进行对话”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印度学者提出聚焦民族与国家的文明及全球化的文明以打破全球文化危机,认为界定文明的概念十分重要,阐述了印度自古以来的文化多元社会(印度有着

“基督宗教与当今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 [方永](#), [杨乐强](#)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宗教学系, 湖北, 武汉, 430072](#)
刊名: [哲学动态](#) 
英文刊名: [PHILOSOPHICAL TRENDS](#)
年, 卷(期): 2001, "" (9)
被引用次数: 0次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xdt200109002.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fc6391ac-b702-4f49-9d65-9e4d00756d68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